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

——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肖 朗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 近代日本; 亚洲国家; 福泽谕吉; “脱亚入欧”思想; 《脱亚论》; “欧洲中心论”; 东亚国际关系; 甲午战争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Invading Asian Countries in Modern Japan: Fukuzawa Yukichi and His Idea of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Xiao L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appeared in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Fukuzawa Yukichi was its main advocator. As the most famous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Modern Japan, Fukuzawa Yukichi's propaganda of enlightenment arou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articularly hi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Japan. However, like many other historical figures, Fukuzawa Yukichi also had noticeabl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He fully accepted the modern West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ivilization" and the idea of "Europe-centeredness" and developed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Civilization equals Europe and America," "Barbarism equals Asia," and "Removing Confucianism equals departure from Asia," which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idea of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In his early works like *On Encouraging Learning* and *A Summary of Comments on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13-12-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4-04-24

[作者简介] 肖朗,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教育史及交流史、学术史研究。

Fukuzawa Yukichi initiated hi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believing that "Reas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Power." Whereas, due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ivilization" and idea of "Europe-centeredness," he regarded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only standard and criterion of evaluating "civilization," and then acknowledged and embraced the perspective on "Dual structur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upon his ideology changed from advocating "Reason" to upholding "Power." He began to preach mighty politics and power diplomacy, totally losing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truth.

In fact,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is beyond a simple geographic concept, because "Asia" and "Europe" here represent two opposite standpoints. The reason why Fukuzawa Yukichi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ropaganda of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his early years was to call on Japanese to improve their spiritual quality and protect "Independence of state" through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However, along with the above change of ideology, Fukuzawa Yukichi began to advocate that Japan should join the camp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wers and carve up China together, showing that his remarks and actions had chang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victim of the invasion" to that of "the invader."

In 1885, he published his article *On Departure from Asia*, which not only marked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Japan's idea of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but also pushed it to the direction of aggression. By propagating this idea, Fukuzawa Yukichi led Japan to stand among Western powers and join their colonial wars of carving up Asia and China, and objectively guided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Key words: modern Japan; Asian countries; Fukuzawa Yukichi; "Departure from Asia and attachment to Europe"; *On Departure from Asia*; "Europe-centerednes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East Asia;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一、导论：一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历史课题

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近代日本较之亚洲其他国家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有独特性的一面。所谓“共同性”,是指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从 19 世纪开始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处在大致相同的国际大背景中。正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指出的:“18、19 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争夺战,其结果是将欧洲以外的世界——无论其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纳入了欧洲这个世界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是被欧洲强制性地拉入到欧洲世界中去的。所谓亚洲的近代,讲得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欧洲近代的一个反射。”^{[1]4}所谓“独特性”,是指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改革之路,彻底废除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成功地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日本“虽然较欧洲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以近代国家的形象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登场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国(指日本——笔者注)也就成了亚洲唯一的一个近代国家”^{[1]4-5}。可以说,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日本较之亚洲其他国家面临着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即日本应如何处理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准确地说,如何摆正与西方列强和亚洲各国的关系?历史学家鹿野政直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日本的使命究竟在何处,是作为亚洲的一国,还是作为欧美的一翼,抑或谋划调和上述两者?这个问题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国民的课题之一。”^{[2]155}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围绕着上述问题,在日本逐渐形成了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及思潮。例如,21世纪以来引起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和研讨的日本“亚细亚主义”就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虽然参加研讨的学者对“亚细亚主义”的早期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已形成以下共识:经过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变迁发展,“亚细亚主义”的本质可概括为以“兴亚”之名行“侵亚”之实^①。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同样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并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的“脱亚入欧”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即为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因为正是福泽谕吉于1885发表的《脱亚论》一文标志着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就先后翻译出版了福泽谕吉的两部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后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的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毕生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出版说明,1这几乎成了我国学界关于福泽谕吉的定评,长期以来为许多出版物所沿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又翻译出版了《福泽谕吉自传》一书,该书的“出版说明”在介绍福泽谕吉的前期思想及活动时基本上采用了上述评价,同时指出:“福泽谕吉的思想到了后期,日益趋向保守……因此他虽然大声疾呼‘民主、自由’,但他自己并未参加后来在日本澎湃发展起来的争取自由民权的民主运动。以后,他进一步站在‘国权主义’的立场上,拥护天皇制,鼓吹尽忠报国的道德教育,主张对朝鲜、中国进行武力扩张。”^[4]出版说明,Ⅲ但仍只字未提福泽谕吉所发表的《脱亚论》一文及其“脱亚入欧”思想,更遑论从福泽谕吉的前期著作中揭示其“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及其逻辑前提。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的学者在论述日本的中国学史时将“脱亚论”的形成视为日本传统的“一元论中国观”破产的原因之一^[5]162-167。进入21世纪,有学者在考察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时也提及“脱亚入欧”思想,并认为它“对后来亚洲历史的发展以及兴亚大业都造成了影响和破坏,其负面作用极大”^[6]101,但限于其特定的视点或主题,他们均未对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进行深入的剖析。更有甚者,国内有些出版物由于未把近代日本的“脱亚”概念以及“脱亚入欧”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认真研究,竟将“脱亚”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加以引用^②。上述状况不仅说明我国学界对福泽谕吉思想的研究有欠全面和系统,而且反映出人们对近代日本的认识存在的不足甚至是误区。

另一方面,翻检日文的有关文献资料,便可发现日本学界对福泽谕吉的国际关系论以及“脱亚论”的理解和把握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著名学者、哲学家丸山真男认为:从福泽谕吉的《唐人往来》(1865年)到《劝学篇》(1873年)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平等观,而从《通俗国权论》(1878年)开始便转向了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国际政治观;与此相应,福泽谕吉的亚洲观也不断从“亚洲连带论”向“亚洲改造论”,进一步向“亚洲分割论”(“脱亚论”)转变^[7]第4卷,412-426。桥川文三则以近代中日关系为中心,将福泽谕吉中国观转变的轨迹概括为四个阶段:(1)“日清同盟论”; (2)“清国改造论”; (3)“脱亚论”; (4)“中国分割论”(“侵略论”)^[8]23。针对上述主流观点,以著名史学家远山茂树和青木功一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对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做了细致的考察,认为福泽谕吉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发生过明显的变化和动摇,但总的来说对中

① 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及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

② 如《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在论述导入外来先进文化的意义时认为,“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型文化的范例”。书中举例道:“它(指日本——笔者注)在古代一直以中国为师,深受中国文化的恩惠。在近代当它意识到不以西方为师便难以生存和发展时,便断然‘脱亚’,而大量地、普遍地引进西方文化,终于使自己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0页。

国是“蔑视”与“警戒”的态度交替出现,并不曾表现出想与中国联盟的“亲善”或“友好”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主流观点^[9-10]。与此同时,安川寿之辅结合福泽谕吉及日本近代的教育思想,在深入发掘福泽谕吉“脱亚论”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指出,“国家平等说并非当时(指启蒙时期——笔者注)福泽谕吉的国际社会观的基本立场”^{[11]198},对上述主流观点做了更彻底的批判。

由此可见,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思想与“亚细亚主义”一样,是一种曾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社会思想,因而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尽管他们对福泽谕吉形成这种思想的认识根源等问题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都一致认为这种思想形成后对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及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然而,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对这种思想尚未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有鉴于此,本文在对福泽谕吉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论著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拟就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做一具体考察。

二、“欧美-亚洲”思想模式的形成

(一)“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西方近代各种思想和学说如潮水般涌入日本,以法国史学家基佐(F. P. G. Guizot)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勒(H. T. Backle)为代表的“文明史观”就是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影响较大的史学思想。这种思想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为中心和模式,试图揭示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普遍法则及规律,从而为近代日本人认识本国及亚洲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和方法。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探讨所谓西洋文明的来源等问题时就明确写道:“在这里只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3]121}。他在阐述人类思想活动的规律时又直接引用了巴克勒《英国文明史》中的话^{②[3]46}。可以说,福泽谕吉正是在接受了基佐和巴克勒的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文明论的,而“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则贯穿于福泽谕吉一生的思想之中^[12-13]。

必须指出的是,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形成不仅以上述“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为思想基础,而且也与他本人在明治维新前三次出访欧美各国的亲身体验有密切关系。1860年1月,福泽谕吉乘“咸临丸”号军舰从浦贺港渡海至美国,在旧金山逗留约三个月。两年后,他从长崎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入印度洋,又经红海抵达开罗,后横渡地中海,到欧洲后游历了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等国,于当年年底返回日本。1867年年初,他再次渡美,经旧金山、巴拿马地峡到达纽约和华盛顿。三次出访欧美的经历加深了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这一点反映在他日后编撰的《西航记》、《西洋事情》、《世界国尽》等书中。例如,福泽谕吉在《世界国尽》中写道:“虽在名义上未标榜文明开化的中心,但事实上为了使人们受到教育、提高道德修养、开启智慧,以便尽显文学技艺之美而在城乡各地建立学问所(指学校——笔者注),不知多达几千万处。”^{[14]第2卷,611-622}盛赞欧洲各国文化教育之发达。另外,他也曾介绍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以区分是非曲直的从善之心来不断学习的才能,被视为人这种万物之灵的天性和千古不易之大义,即便借助他人身心之劳苦也无法获得的吾人之自由,乃建立在天理之上,此种报国之赤诚丹心遂使一国独立不羁之势不可阻挡。”^{[14]第2卷,633-634}

① 日本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鹿野政直曾把“脱亚论”归结为“中国分割论”和“朝鲜支配论”,即瓜分中国和统治朝鲜两个具体的方面。参见鹿野政直《福泽谕吉》,(东京)清水书院1967年版,第157-160页。

② 该书中将巴克勒译作“勃库尔”。

另一方面,三次出访欧美也成为福泽谕吉了解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契机。幕府末年,日本的武士及知识人,特别是那些主张“海防论”的“志士”们大都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主要参考书来了解“夷情”,继而渡海出国。此时,正值晚清中国的流民以及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部分亡命者涌入太平洋周边的国家及地区,海外华侨社会急速膨胀的历史时期。因此,对那些渡海出国的日本人来说,与欧美世界的初次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太平天国被清政府联合西方列强所镇压等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消息给日本人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刺激,使他们逐渐形成了西方由“夷狄”之邦上升为“文明”之国的强烈印象,而清政府竟被迫与西方列强缔结“城下之盟”的命运也大大改变了他们心目中中国自古乃“天朝大国”的传统形象。可以说,三次出访欧美的经历使福泽谕吉产生了与此类似的感受和心态,并对其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5]。例如,1862年出访欧洲途径香港的福泽谕吉日后在《西洋旅案内》一书中记载道:香港“原为支那(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通称——笔者注)的领地,天保十三年(即1842年——笔者注)支那人因与英国之战失败而签订的和约中,规定将该岛的主权让与英国,致使成为后者的殖民地”^{[14]第2卷,134}。同年,福泽谕吉抵达俄罗斯首都彼得堡时会见一位名叫戈鲁涅夫斯基的医生并谈及清朝的有关情况,这在《西航记》中留下了一段记录:“八月朔日。俄罗斯医生戈鲁涅夫斯基来访。此人三个月前从支那北京出发,经陆路昨日抵达彼得堡……据说,现今支那的景况,同治帝年7岁,恭亲王摄政,政治尚好。尚有两太后(指东太后和西太后——笔者注),亦参听国政。约百日前长发贼(指太平天国军——笔者注)杀法国水师提督。此后,英法联军助北京剿长发贼,胜负未分。”^{①[14]第19卷,46-47}在巴黎逗留期间,福泽谕吉还曾接待一位名叫唐学埏的中国人,《西航记》对此记载道:“闰八月朔日。唐学埏来谈。此人为支那人,三年前为了学英语并探访有关情况来到伦敦。日本使节团在伦敦期间,他曾屡次到旅馆拜访。他说现今为学法语而来巴黎,将逗留一年……据此人说,当今支那皇帝尚年幼,其叔父恭亲王咄咄呢摄政,与外国的交往尚好。二、三个月前,在英法联军的助剿下,屡屡攻克长发贼。还雇佣英国人华尔为将军,训练八千士卒。”^{②[14]第19卷,52}

由此可见,三次出访欧美使福泽谕吉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了解欧美各国以及亚洲国家的真实现状,西方近代文明的发达和强盛、亚洲传统文明的衰落和软弱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残酷现实深深地唤起了福泽谕吉的危机意识。在将亲身感受与基佐、巴克尔等人的论述相比照的基础上,福泽谕吉认为自己的亲身感受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两人的论述,于是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明观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阶段论。在《掌中万国一览》中,他率先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四阶段说”,即“浑沌→蛮野→未开化(半开化)→开化文明”的模式,并认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已到达“开化文明”阶段,而中国、土耳其、伊朗等亚洲国家尚处于“未开化”阶段^{[14]第2卷,463-465}。继而,他在《世界国尽》附录“人类的地学”中将世界各国“风俗生产的方式”粗分为“蛮野”和“文明开化”两种类型后,再次提到上述“四阶段说”^{[14]第2卷,第663-665}。最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将“四阶段说”归结为“野蛮→半开化→文明”的“三阶段说”,指出:“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3]11}他在将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视为“半开化”社会的同时认为:“现代世界文明的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3]9}

当然,福泽谕吉在阐述其文明阶段论时并未将“文明”看作“死的东西”,也未认为西方近代文明已“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3]11}。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是大体上来看,西洋各国朝文明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

① 此处是指1862年5月17日在上海郊外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中法国海军提督Protet被击毙。

② 华尔即所谓“常胜军”统帅美国人F. T. Ward,此处误认为他是英国人。

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3]11}。但福泽谕吉强调:“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此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3]11}在他看来,“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关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3]9}于是,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写下了题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一章,将脱离“半开化”状态而达到西方近代文明的阶段确定为日本和亚洲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福泽谕吉的上述议论对明治初期的日本来说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他在理论上全盘接受了基佐、巴克尔等人的“文明史观”及其“欧洲中心论”,他的文明观及其文明阶段论将西方文明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在“文明与非文明”以及“文明=欧美”、“野蛮=亚洲”的思维框架中认识和把握日本及亚洲各国的现代化问题,从而形成了“欧美-亚洲”的思想模式,这不仅暴露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在此已经埋下了《脱亚论》及其“脱亚入欧”思想萌生的种子。

(二) 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

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夷狄”的思想模式一直支配着封建社会日本人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到了江户时代,尽管有少数日本学者开始重视和探讨日本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但这不过是认为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日本并不劣于中国,甚至认为日本是一个比中国有着更为优越的仁义道德的国家。然而,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导入,特别是由于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为代表的日本先进知识人从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中觉醒,中国作为“天朝大国”的神圣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趋于崩溃^[16]。以此为契机,日本人开始摆脱“中华-夷狄”思想模式的束缚,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观和国际关系论。

福泽谕吉第二次出访欧美回国之际,正值“攘夷论”在日本甚嚣尘上之时。为克服以“中华-夷狄”模式来把握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的思想传统,福泽谕吉写了《唐人往来》一书。在书中,他针对日本“自认为神圣的国家,厌恶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作茧自缚而排外”的观念,以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为例,指出这场灾祸即起因于“中华-夷狄”的思想模式,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不明世界的情况,自视为至尊至上的国度,更不知学习他国从事改革的痼疾”^{[14]第1卷,14}。福泽谕吉以清朝为反面教材批判日本“攘夷论”思想的同时,试图阐述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论。他指出,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语言等虽不相同,但在人情、道德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日本应该与外国交往,通过缔结条约与之和睦相处,并遵循“世界普遍的道理”^{[14]第1卷,20},以求取信于他国。他进一步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也应该以“世界普遍的道理”为原则,因而他在《劝学篇》中曾写道:“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奴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17]4}“一般来说,欧美的国家富强,亚非的国家贫弱。可见国家的现实情况虽有贫富强弱之别,但如现在有些国家想凭仗富强之势欺负弱国,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利来说是不能容许的。”^{[17]14}在这里,福泽谕吉试图阐述的是以“世界普遍的道理”为原则的平等的国际关系论。

但是,19世纪后半叶已不是基佐所处的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也不是曾对巴克尔产生深刻影响的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不久的时代,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为了维护势力均衡的国际政治秩序而主张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平等原则,而对亚、非、拉地区其他国家则推行强权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武装侵略。福泽谕吉对上述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已成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意识形态这一现实十分清楚,因而他一方面主张以“世界普遍的道理”为原则的平等的国际关系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国际关系

论中的“二重构造观”。在《内可忍外不可忍》一文中他就写道：“万国公法体现在何处？……这一公法是欧罗巴各国的公法，而丝毫不是为了在东洋起作用。”^{[14]第19卷,225}在《文明论概略》中他又指出：“所谓万民平等的意义，不只是一国之内人民彼此之间权利平等，而是这一国的人民和另一国的人民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国与另一国之间也是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的意思。然而，自从外国人到日本通商以来，虽然条约上明文规定彼此平等，但实际上，绝对不然。”^{[3]179-180}此后，随着欧美列强在亚、非、拉各国的殖民侵略愈演愈烈，福泽谕吉进一步强调了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并表现出与之妥协的态度。例如，《通俗国权论》中写道：“看一下世界古今的事实吧。贫弱无智的小国依靠条约和公法来保全其独立的体面的例子几乎找不到，这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吗？上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7]第4卷,108}在《时事小言》一文中他又说：“所谓万国公法以及万国普遍的权利，虽然都有万国的字样，事实上并不是世界万国之义，而仅仅是在基督教国家内部通行。”^{[14]第5卷,184}福泽谕吉对上述“二重构造观”的妥协和信奉日后便左右了他本人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甚至渗透到他关于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认识及言论中，最终演化为《脱亚论》及其“脱亚入欧”思想。

面对亚洲各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福泽谕吉把确保“一国独立”确定为日本“文明化”即现代化的基本方针。他曾反复说明：“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3]24}“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3]190}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重视和强调“一国独立”的福泽谕吉对深受鸦片之害的中国人民却并未寄予同情，相反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来解释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甚至抨击林则徐主持禁烟的正义行为。早在三次出访欧美回国后撰写的《世界国尽》中，福泽谕吉就写道：中国“不修德政，不崇教化，自以为除己之外世上别无他人，因不了解世界而高枕无忧，暴君污吏横行欺压百姓，其恶政终逃不脱上天的惩罚，结果于天保十一年（1840年——笔者注）与英国不和而导致战争，战败后求和，赔偿白银两千一百万两、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以惩其无智之民。毫无道理地妄自挑起战端，羸弱之兵屡战屡败以至有今日之下场，实在可悲”^{[14]第2卷,594-595}。在《唐人往来》中他又写道：“林则徐是一个缺乏智慧且急性之人……毫不讲道理地将英国运来的鸦片无端烧毁，结果触怒了英国，遭其军队的沉重打击。时至今日，世界上无人谴责英国而只是嘲笑唐人（指中国人——笔者注）。”^{①[14]第1卷,21}他还污蔑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虽人数众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不懂兵法”^{[14]第2卷,12}。在这里，福泽谕吉完全违背了他本人赞成和提倡的“世界普遍的道理”，相反在承认和信奉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的基础上将捍卫“一国独立”的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污蔑为“毫不讲道理”的野蛮行为，充分说明早在启蒙时期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著述中就隐藏并流露出蔑视亚洲、蔑视中国的心态，同时与上述“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相结合，在客观上导致了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辩护的负面效果。

三、从“脱儒”到“脱亚”的蜕变

（一）中日传统文明的比较

如前所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刺激，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有识之士从中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弊端，遂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学术。

① 福泽谕吉在《西洋旅案内》一书中也对林则徐做了类似的评价。

佐久间象山曾尖锐地批评明清两代儒学的内容和方法:“所学不得要领,而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谈,更渐流于训诂考据之末,其间虽不乏一、二学者有志于有用之学,但终究有失于格物穷理之实。”^{[16]284}高杉晋作于1862年游历上海期间目睹清朝衰落的形势,后在《游清五录》中写下了他的观感:“支那衰微的形势已如上述,但考察其为何衰微,原因则在于支那人不知海上防夷之道。彼既无可凌驾于万里海涛之上的军舰,也未制造可御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更有甚者,彼邦志士所撰之《海国图志》亦已绝版,而徒守固陋之说,因循苟且,空耗岁月。”^{[18]150}事实上,这类看法已成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日本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一部分知识人的共识。所不同的是,福泽谕吉由于接受了基佐、巴克尔等人的“文明史观”,遂从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高度,并通过中日两国传统文明的比较考察,力求揭示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及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

正如福泽谕吉所指出的,其代表作《文明论概略》论述的范围不限于中日两国传统文明,而是以“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①[3]1}为主题。但为了号召和鼓励日本人民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尽快走上现代化的改革之路,福泽谕吉通过中日传统文明的比较考察,对中国传统文明及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做了剖析。首先,他指出:“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缘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3]16}本着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自秦朝建立中央封建集权统治以后,“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指皇帝——笔者注)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3]17}。日本的情况在上古时代与中国基本相同,“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至尊的天皇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力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指天皇——笔者注)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作凡人。”因此,福泽谕吉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人的思想是贫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3]17-18}

依据上述比较考察及分析,正如文明本身即由多元的因素所构成,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因为这种多元化给予人们的精神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较之日本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权力和宗教(包括文教)权威一元化的特征,即“政教合一”的特征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精神的自由发展,由此造成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停滞落后。福泽谕吉的中国文明观不仅是在借鉴基佐、巴克尔等人的“文明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与西方近代居主流地位的中国文明观一脉相承。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19]129}黑格尔则断言:“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0]123}黑格尔遂成为西方主张“中国历史停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关于中日传统文明的比较考察,特别是他的中国文明观后被赖肖尔(E. O. Reischauer)等美国学者所继承^[21-22],并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如桥川文三称赞道:“这种日本史观、中国史观,尤其是比较史观所达到的卓越高超,是不言而喻的。”^{[8]29}然而,仔细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福泽谕吉的中国文明观中存在若干片面之处。

① 福泽谕吉在此处还说道:“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固然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但并未被人们普遍视为“神”,而通常被称作“天子”,因而其言行也必须遵从“天命”和“天意”。在中国历史上,大臣们自称秉承“天命”和“天意”向皇帝提出建议甚至批评皇帝言行的事例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采用福泽谕吉的分析方法,便可推论出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也包含着二元的价值要素。

其次,福泽谕吉在开展其中日传统文明的比较考察时,浮现在他眼前的中国传统文明主要是儒家文化,他本人自幼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据《福泽谕吉自传》记载,他从十四五岁开始读了《孟子》、《论语》、《诗经》、《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4]7-8},这说明其汉学教养主要限于经、史的范围,并未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的著述及其学说,而且曾对中国传统文明产生过极大影响的道教、佛教等思想因素也未进入他的视野。可见,福泽谕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有较大的局限性。

最后,即便是儒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说儒学从两汉经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就吸收了佛教等外来思想因素,况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若干批判儒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及其学说,这些历史事实均为福泽谕吉所忽视。

诚然,福泽谕吉关于中日传统文明的比较考察,尤其是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甚至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3-24]。但由于视野和方法的局限性,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不恰当地扩大到了对整个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批判,甚至意味着对亚洲和东方文明的蔑视和否定,这种立场及态度遂成为他日后发表《脱亚论》和提倡“脱亚入欧”思想的逻辑前提。

(二)“脱儒=脱亚”的逻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人士在从“开眼看世界”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将西方近代社会视为未知的异文化系统,对此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样,福泽谕吉也通过三次出访欧美各国和不断研读、译述外文著作来了解西方社会及其近代文明。他认识到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明,首先必须学习的不是其“文明的外表”,诸如学校、工业、陆海军等,而是其“文明的精神”,这是“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也就失去作用……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独立的精神。”^{[17]28-29}他认为,日本人自古缺乏独立精神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的情况^{[3]153},即权力总是偏在统治者一方,学术、宗教、工商业都依赖于统治者,而财富、荣誉等也均与权力相结合。具体地说,“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仅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17]22-23}。福泽谕吉断定造成这种风气的主要原因是推崇“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在作怪,晚年他在自传中写了一句名言:“拿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4]180}因此,为了使日本国民形成“独立的精神”,他主张与儒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决裂。有的日本学者赞誉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以往未曾有过、今后亦罕有能与之匹敌的犀利的言论”^{[9]86}。

然而,如前所述,福泽谕吉全盘接受了基佐、巴克尔等人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中国文明观,在他的思想中存在下列双重的逻辑等式:(1)“文明=欧美、野蛮=亚洲”;(2)“儒家文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亚洲文明”,因此,在福泽谕吉那里,脱离作为“野蛮”象征的儒家文化就逻辑地转换为脱离亚洲文明,“脱儒=脱亚”的逻辑遂得以成立。对此,有学者分析道:“福泽谕吉反对把日本与中国、朝鲜作为一体来把握,在他看来,所谓‘东洋’仅仅是个

地理概念,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中国、朝鲜。他认为日本不是东洋的一员,而是亚洲的‘远西’,即‘文明世界’的一员。”^{[6]141}

如果说福泽谕吉曾将西方近代文明视为一个未知的异文化系统而加以亲身考察和认真研究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没有这样做。事实上,福泽谕吉缺乏直接接触过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即使在出访欧美期间他所接触到的只是海外华侨社会,所观察到的也只是香港这一特殊地区。因此,他对中国的认识及其中国文明观,主要建立在幼年的汉学教养、在巴黎时与中国人的片段谈话以及近代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有关著述的基础上。福泽谕吉曾论及中国与日本的区别,就曾就中日两国的传统文明做过比较考察,但他主要是为了说明“顽固落后”的中国的文明程度低于日本,中国尚处在“半开化”的阶段,而并不是将中国传统文明视为一个未知的文化系统;相反,他又认为日本社会所存在的旧的弊端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明及儒家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即为日本封建社会的原型,因而对他来说,中国毫无文化上的距离感,其传统文明不过是一个已知的文化系统。这样一来,儒家文化在成为福泽谕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的同时,中国也就成了其“东洋政略论”中的敌对国家。

四、《脱亚论》的发表与甲午战争的爆发

(一)《脱亚论》的发表

从日本近代史上来看,“脱亚入欧”思想并非始于福泽谕吉。早在 1871 年明治政府曾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各国考察,使节团回国后向政府递交的报告中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越东洋。将此开明之风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5]164} 报告书提出日本应移入“西洋之风”,以达到“同等化域”,可谓“脱亚入欧”思想的雏形。1879 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发表了一系列宣扬“脱亚入欧”思想的言论,对这种思潮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福泽谕吉在关注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其外交、军事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东洋政略论”,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脱亚论》,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同时并存的追求‘国权扩张’的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国权扩张’论,是以把日本实现本国最大的利益作为前提性主体,而以蔑视中国和朝鲜的主权利益为基础的。因此,‘脱亚论’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从精神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导致日本人的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的扩张欲望。”^{[5]165} 可以说,《脱亚论》是在福泽谕吉的“东洋政略论”形成的过程中抛出的,也是在日本“国权扩张”思想不断膨胀的历史背景下抛出的。

福泽谕吉早在 1881 年发表的《时事小言》中就写道:“假若独立仅仅意味着一国的独立,那么只要谋求我日本一国的独立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决非如此。试看人们防火的情况。假设我一家为石屋,而隔壁邻居却是粗糙的木板屋,那就无法安心下来……现今,西洋诸国充满威势地向东洋逼来,其势与大火蔓延无异,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我国近邻的支那、朝鲜等却迟钝得不能阻挡这种形势,这与木板屋不堪火烧是同样道理。”^{[14]第5卷,186-187} 可见,福泽谕吉认为邻国中国、朝鲜尚处在顽固未开化的状态,日本为了保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定应该对亚洲的现代化起到推进作用;同时,他对日本在亚洲率先导入西方文明以推进近代化改革满怀优越感,声称:“在亚洲东方成为魁首盟主者,惟我日本。”^{[14]第8卷,30} 并主张在日本主导下谋求日中朝“三国的文明,共同振兴文明以固守各自的独立,不容西洋人在东洋鼾睡”^{[14]第8卷,427}。此时福泽谕吉的“东洋政略论”的确带有所谓“亚洲连带论”的色彩,但以“文明的日本-半开化的中国和朝鲜”的思维模式来考虑东亚现代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强调

日本的主导作用而忽视邻国现代化的主体性,仍然暴露出这种“亚洲连带论”具有极为脆弱的一面。

从1882年到1884年,福泽谕吉以朝鲜问题为中心,围绕中日朝三国关系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言论,其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两个侧面:一方面,他宣称:中国人“妄信儒教而不理解事物的真理”,堪与土耳其人并列为“文明境外无识之愚民”^{[14]第8卷,504},因而确信较之中国,日本在文明开化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了解到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朝的军事力量有了显著增强,故曾预言今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东洋的军事强国^{[14]第5卷,311},借以提醒和唤起日本对中国的警惕。这一时期,由于朝鲜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尤其是因为1882年的“壬午事变”和1884年的“甲申事变”相继被清朝镇压,日本朝野上下主张出兵朝鲜的呼声日益高涨。值此时机,福泽谕吉的“东洋政略论”开始由“消极的防御”迅速地向“积极的远略”倾斜和转变^{[14]第5卷,313}。“壬午事变”发生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反复宣称:“在国际关系的政略方面几乎看不到道德的成分……大义名分之谈都是无用的。”^{[14]第8卷,270}“就外交情况而言,今日的世界尚非道理的世界,而是武力的世界。”^{[14]第5卷,297}“数万言的万国公法,硝烟一声即可抹杀”^{[14]第5卷,304-305}。为了使日本取代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福泽谕吉进一步主张日本推行强硬路线,与中国开战,声称只要与中国“开战,即可一击挫败东洋之老大朽木”^{[14]第8卷,305}。看到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不但没有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对西方列强的谴责,反而认为:“世界各国相对峙,势同禽兽相食,食者乃文明国,被食者乃不文明国,我日本国应加入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一起以求良饵。”^{[14]第9卷,195-196}公开主张日本积极加入“食者的行列”以求中国这一“良饵”。他甚至露骨地说道:“既然中国不能自立而将落入诸外国人之手,那么我日本国岂有袖手旁观之理?我们也只有奋起逐鹿中原(指中国——笔者注)。”^{[14]第5卷,313}遂向日本政府鼓吹参加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殖民战争。“甲申事变”后,福泽谕吉已成为当时日本主张与中国开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日中开战关系到“日本国的存亡兴废”^{[14]第10卷,161},号召日本人不惜自己的一身“向北京进军”,不惜自己的财产“以此献作军费”^{[14]第10卷,162}。

1885年3月,针对亚洲及世界的形势,福泽谕吉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发表了《脱亚论》一文,正式提出了“脱亚”的概念及口号。这篇不过两千余字的短文主要表达了以下三层意思:(1)面对“西洋文明之风东渐”的大势,日本“国中朝野别无选择,一切万事皆采近时西洋之文明,此不仅独脱日本之旧套,而于亚细亚全洲之中将出现一新转机,此主义唯在‘脱亚’二字”^{[14]第10卷,239}。(2)“我日本国土虽处亚洲之东陲,但国民精神既脱亚洲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均不知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的世界之中虽并非未闻见文明的事物,但其耳目闻见却不足以动其心,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若不思改进,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14]第10卷,239}(3)“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国无一毫之帮助……我国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不可因支那、朝鲜乃我国之邻邦便对之特别客气,而应仿效西洋人之方式加以处理。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故吾心唯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14]第10卷,240}正如有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脱亚论》的内容其实并无任何新意”^{[25]128}。它重复了福泽谕吉所接受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表达了福泽谕吉早在明治初期就怀有的蔑视亚洲、蔑视中国的心态,但结合这一时期日本的历史背景及福泽谕吉的“东洋政略论”,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福泽谕吉首次将中国和朝鲜称为“东方之恶友”,明确主张与两国断绝交往,而且表示不赞成早期“亚细亚主义”提出的“兴亚论”的主张,力图斩断日本与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的“连带”关系及其纽带,从而将日本置于亚洲国家的对立面甚至是敌对面。

其二,他极力主张日本应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之中,参与其瓜分亚洲及中国的殖民战争,所谓“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应仿效西洋人之方式加以处理”等表述的潜在含义即在于

此,从而进一步企图引导日本走向对外侵略的战争之路。

综上所述,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福泽谕吉的“东洋政略论”伴随着日本“国权扩张”思想的膨胀而形成,在此过程中福泽谕吉从对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的承认、妥协发展到积极利用,并在此基础上抛出《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将之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近十年后甲午战争的爆发,终于使《脱亚论》所鼓吹的侵略思想变成了侵略战争的现实。

(二)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福泽谕吉的言行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的召开及宪法的颁布,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得以确立,“国权扩张”已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及基本方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面对朝鲜发生的“东学党事件”,福泽谕吉就宣称:“朝鲜战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国利益,并不是为他人,是为我们自己。”^{[14]第13卷,465}把出兵干预“东学党事件”看作日本取代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的良机。为此,他一再强调:“日本国防军备应把扩充海军放在第一位”^{[14]第13卷,551},“制造军舰是国防的当务之急,刻不容缓”^{[14]第13卷,625},并极力反对日本议会关于削减海军军费的议案。1893 年 5 月,福泽谕吉在日本政府内阁尚未做出决议之前,就以“保护在朝九千多日本侨民”为由要求派兵进驻朝鲜。

甲午战争爆发之年,福泽谕吉已届 60 岁高龄,他因“多年来被人不屑一顾的东洋政略的主旨终于迎来了实现的机会而欣喜雀跃,倍感兴奋,连日笔耕不辍,为了鼓舞国民的斗志而不知疲倦……自己作为发起人组织报国会,纠集华族开展募捐军费的活动”^{[14]第14卷,688}。他自己带头捐献了一万日元作为军费,这成为当时日本全国名列第二的巨额军费捐款。1894 年 7 月 29 日,即甲午战争宣战前三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题为《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笔者注)是文野之战争》的社论,把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定性为“文明国”日本对“野蛮国”中国的战争^{[14]第14卷,491-492},企图以“文明”的名义将日本对朝鲜、中国的干涉和侵略合理化、正当化。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又连续发表文章、社论,进一步强调:“为文明前进而战,其成败不但关系到日本的利害,而且是有关东洋文明进退的大事,作为其先导要排除万难,一步也不能退缩。”^{[14]第14卷,515}同时,他鼓动日本军队“一定要长驱直入地冲进首都北京,扼其咽喉”^{[14]第14卷,501}。“首先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待明春化雪之际攻陷北京,进一步征服支那四百余州县,以大展我日本之兵威。”^{[14]第14卷,511}

在得知日本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毫不掩饰地表示:“此次战事确是空前之一大快事,人长寿方能目睹此活剧而倍感欣慰……惟有期望引进西洋文明,历经艰辛坎坷而终于欣逢盛事……将邻国支那和朝鲜纳入我文明之中。其喜悦之情足慰平生,可谓喜出望外。”^{[25]259}日后在自传中,福泽谕吉仍念念不忘地写上一笔:“如‘日清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只有活到今天才能看到这种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是不幸的,我真想叫他们也看看这种胜利!每当想起这一点来都要使我落泪。”^{[4]278}他还多次请求日本政府和天皇表彰战死的日本军将士,并表示在靖国神社举行临时祭奠之时若天皇陛下能亲莅现场,对阵亡者的遗族大加赏赐以酬阵亡者的功劳,他将不胜感激。

五、结语: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渊源

作为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后所开展的启蒙宣传活动,特别是他对西方近代文化、教育的导入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但正如许多历史人物具有局限性一样,在福泽谕吉身上也明显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早在其启蒙时期的著述和思想

中已暴露出蔑视亚洲、蔑视中国的心态，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同时，他承认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并与之不断妥协，进而信奉并利用这种观点，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探索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轨迹，不难发现其间发生了双重“转换”。

首先是认识的转换。如前所述，早期福泽谕吉在《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中阐述了以“世界普遍的道理”、“公理”为原则的国际关系论，认为“理性”比“实力”更为重要。但由于他深受西方“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西方文明视为衡量和判断文明的唯一尺度与准则，进而又承认并信奉国际关系论中的“二重构造观”，于是其思想认识发生了从崇尚“理性”到推崇“实力”的转换，开始鼓吹实力政治和强权外交，从而彻底丧失了对真理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其次是立场的转换。事实上，“脱亚入欧”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因为这里的“亚”和“欧”代表着两种迥异的立场。早期福泽谕吉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启蒙宣传和教育活动，旨在号召日本人民提高自身的精神素质，以其“一身独立”来保卫“一国独立”。但随着上述思想认识的转换，福泽谕吉开始主张日本加入欧美列强的阵营而与之一起瓜分中国，致使其言论行为发生了从被侵略者的立场向侵略者的立场的转换。

因此，可以说《脱亚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将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而福泽谕吉正是通过宣扬这种思想引导日本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以参与其瓜分亚洲和中国的殖民战争，并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甲午战争之前，虽然有‘脱亚论’出台，但主张‘日中提携’、联合亚洲各国振兴亚洲的呼声基本处于社会思潮的主流地位。”^{[6]36}但总体而言，日本近代史上主张“脱亚论”的“脱亚入欧”思想和提倡“兴亚论”的“亚细亚主义”这两种思潮异源同流，殊途同归，成为近代日本一步一步地走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并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①。

[参 考 文 献]

- [1]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Nomura Kouyichi, *Modern Japan'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rans. by Zhang Xuefe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9.]
- [2] 鹿野政直：『福澤諭吉』，東京：清水書院，1967年。[Kano Masanao, *Fukuzawa Yukichi*, Tokyo: Shimizu Shoin, 1967.]
- [3]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Fukuzawa Yukichi, *A Summary of Comments on Civilization*, trans. by Beijing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Socie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 [4]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Fukuzawa Yukichi, *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 trans. by Ma B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5] 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Yan Shaoda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China Studies: Vol. 1*,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6]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Wang Ping, *The Asianism in Modern Jap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① 最近，我国学者对以“脱亚论”和“兴亚论”为代表的近代日本侵略亚洲思想的精神实质做了如下生动的比喻和分析：“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即日本与其亚洲邻国在文明层级上有天壤之别，邻国是‘垃圾’，日本则是‘垃圾场’边上的巍峨大厦；对待‘垃圾’，日本要么抱着厌恶的心态在垃圾场上随意践踏一番，要么以怜悯的心态做‘垃圾们’的‘救世主’。”参见庄礼伟《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两大诡异之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第A08版。

- [7]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選集』,東京:岩波書店,1952年。[Fukuzawa Yukichi, *The Se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2.]
- [8] 橋川文三:『順逆の思想——脱亞論以後』,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Hashikawa Fumizo, *The Dilemma of Thought: After the Theory of Departure from Asia*, Tokyo: Keiso Shobo, 1973.]
- [9] 遠山茂樹:『福澤諭吉——思想と政治との関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Touyama Sigeki, *Fukuzawa Yukichi: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oughts and Politic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0.]
- [10] 青木功一:『福澤諭吉の対外観に関する覚書』,『三田評論』1977年769号,1-9頁。[Aoki Koyichi, "The Memo of Fukuzawa Yukichi's Foreign Thought," *Midahyoron*, Vol. 769(1977), pp. 1-9.]
- [11] 安川寿之輔:『増補・日本近代教育の思想構造——福澤諭吉の教育思想研究』,東京:新評論,1992年。[Yasukawa Jyunosuke, *The Thought Structure of Modern Japanese Education: Studies on Fukuzawa Yukichi's Idea of Education(Enlarged Edition)*, Tokyo: Shinhyoron Co., Ltd., 1992.]
- [12] 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3-173页。[Gao Like, "A Contrast between Fukuzawa Yukichi's and Liang Qichao's Modernization Thought," *History Research*, No. 2 (1992), pp. 163-173.]
- [13] 肖朗:『福澤諭吉と梁启超——近代日本と中国思想・文化交流史の一側面』,『日本歴史』1996年5月号,67-82頁。[Xiao Lang, "Fukuzawa Yukichi and Liang Qichao: An Aspect of Exchanges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Cultures between Modern Japan and China," *Japan History*, Vol. 5(1996), pp. 67-82.]
- [14]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8-1971年。[Fukuzawa Yukic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8-1971.]
- [15] 松澤弘陽:『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経験』,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Matuzawa Hiroak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 and Western Experience*,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3.]
- [16] 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編:『日本思想大系』〈55〉,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Sato Syosuke, Uete Mitari & Yamaguti Muneyuki(eds.), *Series of Japanese Thoughts: Vol. 55*, Tokyo: Iwanami Shoten, 1971.]
- [17] [日]福澤諭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Fukuzawa Yukichi, *On Encouraging Learning*, trans. by Qunl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 [18] 高杉晋作:『遊清五録』,『高杉晋作全集』下卷,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74年。[Takasugi Shinsaku, *Five Travel Notes of Traveling in the Qing Empir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kasugi Shinsaku* (II), Tokyo: Shinjinbutsu Ouraisya, 1974.]
- [1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C. S.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I), trans. by Zhang Yans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20]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by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 [21] 赖肖尔:『日本近代化の歴史的評價』,『中央公論』1961年9月号,27-35頁。[E. O. Reischauer, "An Evaluation on the History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Tyukoron*, Vol. 9(1961), pp. 27-35.]
- [22] 赖肖尔:『19世紀の中国と日本の近代化』,『中央公論』1963年3月号,19-28頁。[E. O. Reischauer, "China's and Japan's Modern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Tyukoron*, Vol. 3(1963), pp. 19-28.]
- [23] 陈应年:《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见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9页。[Chen Yingnian,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Japanese Thinkers'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Research Societ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of Beijing(ed.), *Proceedings o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 46-59.]
- [24] 肖朗:《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25-33页。[Xiao Lang,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Fukuzawa Yukichi's Enlightenment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1999), pp. 25-33.]

- [25] 安川寿之輔：『福澤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東京：高文研株式会社，2000年。
[Yasukawa Jyunosuke, *Fukuzawa Yukichi's Understanding of Asia: Restoring the Image of Japan in Modern Times*, Tokyo: Koubunken Co., Ltd., 2000.]

促进农民权利发展的制度选择

龚上华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农民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农民问题历来是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在我国,广大农民不仅拥有和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深入发展,将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他们的利益将得到更多的维护和扩大。回顾和展望农民权利发展的历程,有助于进一步尊重、保障和实现广大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而推动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1. 发展历程。农民权利的获得与党和国家政策演变密不可分,这一演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平台,以农民的当家做主和政治参与为核心的阶段;“放权”给农民,以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为核心的阶段;“减负”和“让利”给农民,以突出农民民主诉求为核心的阶段;以全方位“服务”农民为核心的阶段。归结之,三十多年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就是解放农民,给予农民自主经营、自主选择的权利,从制度上彻底解放农民;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赋权于农民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2. 效度与不足。我国农民的权利变迁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行政赋权而不是法治赋权的过程。通过行政赋权,农民进一步获得了民主自治、完整选举权利的争取与发展以及平等民权等权利。但在实践中,行政赋权导致农民处于被动和从属状态,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依然存在着赋权不足及治权滞后等各种问题。尤其是农民治权行为存在着明显的滞后于赋权进程及治权结构的状况,这种滞后性直接导致了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并经常受到侵害的情况发生。比如,我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上都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对重大决策的知晓权、参与重大事务的权利以及投票权等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操作中农民个体很难有能力、有机会、有渠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实施自己的行为。因此,促进和保护农民权利的发展,寻求深层次的制度供给,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目标所在。

3. 路径选择。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的关键与核心就在于农民赋权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具体来看:一是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实现民主确权,并在国家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中切实保证农民实现基本的权利。二是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的制度,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四个民主”的具体操作制度等,健全制度制定和制度表达机制。三是进一步赋予广大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平等民权。通过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系,实现农民与市民在户籍制度、文教卫、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等方面的一致与均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城乡统筹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农民的迁徙流动自由。四是确保政府各种事务公开,尤其是涉及农民根本利益以及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务要确保公开,确保农民能及时、方便、准确地掌握政府的各项决策。五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强烈,但因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所导致的有些地区、有些领域出现农民维权过激行为等状况,需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的良好机制,拓展参与空间,引导农民走制度化参与的渠道,从而有效满足农民的参与需求。六是有效解决农村利益的均衡问题。如果把农村当作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充满利益的考量。农村各利益相关者必然围绕各自的利益需求展开博弈。因此,基于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利益矛盾、多元化与分散化的利益表述,必须建立健全农村利益商谈机制和利益主体有序参与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有效协商,最终达到农村利益均衡。

总之,要突出农民的主体性、自觉性,努力推动农民的赋权与治权的和谐发展。在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中,不仅要确立农民作为国民和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要确立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这才是赋权农民的根本意义和目标所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C81001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2JDDF01YB)